

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97级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题    目：互动与选择——语境与语体关系论

专    业：现代汉语

研究方向：语体学

指导教师：王兴中教授

研    生：李艳

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0. 昆明

## 目 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前言	(3)
一、概述	(4)
二、语境和语体的关系是互动统一的	(8)
三、语境对语体的选择	(10)
四、语体对语境的适应	(16)
五、结语	(19)
注释出处	(21)
参考文献	(21)

## 中文摘要

虽然早在《圣经·旧约》中就已记载了早期人类对语言分化问题的思考，但语言研究直到近期都是脱离社会的，最近几十年，现代功能语言学日益兴盛才逐渐打破“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传统观念，从而开辟了语言学新的研究领域。

语体学就是其中一株新葩。但是，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有许多空白与不足企待人们去研究、去探索。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各种不同研究模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语体学界的混乱局面，但也不断地为语体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就试图借鉴以上几种研究模式的成果来探讨语境与语体之间的关系。作为两个动态集合，语境和语体之间的关系应是互动统一的。因为语境总是由一系列与语体选择密切相关的因素组成，并和一定的语体选择过程相始终。语境具有强大的功能，它可以确定言语的意义，消除歧义现象并能神奇般地创造言外之意。在言语交际中，语境对语体的选择具有极大的制约性。而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语体对语境的适应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语言是不能遗传的，每个人出生后都必须习得语言，最有趣的是，人类在习得语言的同时也习得了语体。人为什么要习得语体呢？这正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人类不仅要习得语体，还要对它发展完善并灵活地加以运用。因此语体研究是与“人”和“社会”紧密相联的，只有把它定位在语言、社会、人三位一体的构架中，回归语言本位，才能进一步揭开其神秘面纱。

## Abstract

Language research didn't concerned in the society until moder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was set up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Because of this, more and more new fields are to be explored. Stylistics is one of these new fields of language research. But, as a new field, it need people to study, to research. Seen from the study performance now, we can use these min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and style. As two moving things for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and style must be dialectical. Because context is always made by some frame with relate to style selection, and also, go through all process of style selection. Context and style are all important things in this article. We must study their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go into the stylistics.

## 前 言

《圣经·旧约》中巴别通天塔的故事暗含着早期人类关于语言分化问题的思考。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赋予他们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群体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语言。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运用系统。实际上，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并不是语言的存在，而是它的使用——言语。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的概念，但他又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之外，却象古老的巴别城人一样执着地追求人类大同的语言乌托邦。因此，人类发现语言的历史虽然漫长，却一直囿于抽象的、概括的语言规则的静态描写，而忽视了活生生的言语现象。换句话说：“语言研究直到近期一直是脱离社会的。”[1]

最近几十年，现代语言学取得了迅猛发展，尤其是日益昌盛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启发了人们对于言语及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的重视。语言学家仅将精力放在语言结构的静态描述上是远远不够的，语言的使用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环境的等几乎每一个方面。功能语言学主张以人类学为本从社会学出发，把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系统来加以考察。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充当交际工具，从它的使用角度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而社会的主体是人。语言、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的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是对语言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的基本的、必备的条件。否则，语言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语言的使用——言语现象是和社会、个人紧密相联的，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使用主体的不同，言语会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特点，这种相对集中、稳固的特点汇聚起来便成为语言的功能变体——语体。从此种意义上来说，人们每天所接触，所使用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语体。

语体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对语体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加以运用，对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最近几十年的研究中，人们看到了语体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它决定于社会生活的不同类型，因而一再夸大社会生活对语体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语言、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关系，如果一味强调一方而忽视其他，甚至忽视语体作为一种独立事物的存在，势必会使语体研究走向衰竭。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应看到语体本身独具的魅力。语言就是语言，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社会生活之石来攻语体之玉，固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忽视语体本身的研究却会导致

空中架屋的危险。因此，语体研究必须在语言、社会、个人三位一体构架下，回归语言本位，既注重社会生活对语体的制约性，又强调语体本身的能动性。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笔者才萌发了写作此篇论文的念头，希望能于此提出一点颇为羞涩而又闪烁着微光的想法，以供各位方家共鉴。

## 一、概 述

### (一) 语体研究中的不同模式和存在问题

回溯人类历史，有关语体现象的记载古已有之，但它零星地散落在哲学、历史、文学等有关的书籍中，而比较系统、全面的语体研究却是现代语言学创立以后的事情了。确切地说，是进入本世纪中叶以来，才有了蓬勃而迅猛的发展。但综观其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语体领域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流派都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但几十年来，各家鼎立，自成一派，始终没有哪种观点可以“一统天下”。这样，在促进语体学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迷惘和混乱，清楚地了解和认识这种局面，对于本文的写作是非常必要的。根据其学术观点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

1、语域模式 这种模式来源于语境支配言语活动并决定意义的思想。力图通过语境中各种情境因素的系统分析，在语言特征与情景因素之间建立起普遍的联系，以此来描写和解释语言运用中的变化和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语体。其代表人物哈利迪提出了“语域”概念，以此来解释语境和语体两个端点的关系。他为系统地描写和分析语体现象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改变了过去语体研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状况。在这种框架下，不少人对各种各样的语体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尤其是在对语体形式结构特征的描写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详尽程度，使语体分析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而不象以往那样主要依靠对语言的直觉和印象。但这种理论模式过于强调语境对语体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语体本身也是一种动态集合，对于各种语体在词汇、语法、句式等方面的语言特征的详尽描写，又流于传统语言学静态写生式的研究方法，对于这些语言特征在特定语体中出现的原因和目的缺乏强有力的解释。

2、修辞模式 这一模式的研究方法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在此书中，他详细论述了演说和辩论语体的特点，以

及如何选用恰当的语言材料和培养灵活的语言技巧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西方修辞学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深远影响下，语体研究一直处于修辞学的领导之下。但其考察范围过于狭窄，试图通过对论辩、劝说之类语体的分析，归纳和抽象出一些可供人效法的规范。当然，现代修辞学已经从规定转为描写，研究范围也日趋广阔，但是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更为注重交际目的和意图。这种目的论型的思维方式对语体研究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其重点在于确定语言成分在某种语体中的构成是否具有在其他语体中所没有的特殊功能，是否获得了在该语体中特定的修辞效果。由于视野不够宽阔，其研究虽然颇具洞察力，但却深而不广，缺乏对语体现象的全面把握。国内的语体研究大都借鉴此种模式，将语体作为修辞学的下位概念，这样虽然可以直接切入语体内部进行具体的分析，也难免会有一些的局限性。

3、交际模式 这种模式认为言语交际是双向的沟通活动，话语的生产是所有交际者相互作用、共同行为的结果。在交际过程中，听读者并非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决定着话语的生产。因此，依照这种观点，所有的语言运用从本质上都是交际双方共同参与的，交际参与者不同是造成语言运用各不相同的原因，对语体研究来说，只能从人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出语体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并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交际主体的重要性，并因其复杂性、个体性而使语体研究流于琐细。但它强调结合交际过程来考察语言的具体运用，而且不满足于对语体进行简单的分门别类和静态描写，而是力求对特定语体现象作更为细致的动态分析。从当前来看，运用这一模式进行的语体研究似乎不多，成果也不显著，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了它的发展潜力。

4、文体模式 文体学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具有深厚的历史沉积力，但是借用文体概念来研究语体却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由于文体概念的深远影响以及语体的复杂多样，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文体与语体概念混淆的局面，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新的突破，这便是“原型性”概念的提出。它认为语体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使用程式，而是一种动态的集合体。在构成该语体的众多语言特征中，有一部分成为核心并相对稳固的存在于该语体中，成为其区别于其他语体的标志；而在其使用中，其他一些次要特征则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变化和差异，甚至游离到其他语体中，但这并不影响该语体的性质，因此语体是一种原型存在。原型存在使整个语体体系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从而使语体的学习和使用成为可能，但这种稳定性又不是僵化不动的，它可以随着情景因素和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对语言特征

体系作相应的局部调整，将语体进行延伸（语体交叉、渗透、融合等），而无须更新整个体系。这无疑为语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式。

综观以上几种研究模式，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些模式常常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当代语体研究正在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考察和探索的活动，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种研究成果的介入，将促使语体研究进入多视角、多途径的发展阶段。

## （二）语境和语体的界定

各种模式的综合研究是从功能角度研究语体的必然结果。语体的研究不外乎有两个端点，一端是超语言的情境因素，它包括交际的场合、方式、内容和交际者等，而另一端则是语言特征，包括语音、语法、语义等多个层面的概念。功能的标准即是以语言特征为本位来考察在超语言情景因素的制约下语言特征体系的形成和分化，功能则是连接两个端点的纽带。超语言情景因素和语言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语体研究的热点，也是争论颇多的问题。在此笔者试图借鉴以上不同研究模式的精华，纳众家之所长，以求能阐明这一重大课题。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使用语言的人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即在特定的场合，就特定的范围，为特定的目的，向特定的对象进行交际。这特定的环境对语言的使用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促使语言材料发生功能分化，各自形成一系列运用语言材料的特点，这些特点汇聚起来就产生了语言的功能变体——语体。〔2〕

首先，语体是社会交际需要的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语体并非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人们在言语实践中逐渐感觉到、认识到的。社会产生之初，人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无须对语言进行功能分化；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也必然会产生分化，久而久之形成各种语体。因此从社会进程看，语体是历史分化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活的范围和方式也会发生改变，导致不同时代语体系统的差异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交际范围也更为广泛，交际领域、目的的差异，必然在交际方式、语言手段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语体正是这些特点的综合表现，它为了适应这种差异而形成，作为社会交际需要的产物而存在。

其次，语体又是全民语言材料特点的综合。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也不尽相同，因此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交际领域不可能完全等同，而且各民族在运用语言材料方面也各具特点，这就决定了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体系统。即使同一语体，在不同的民族中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对等。比如英国和美国都使用英语，但如果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会面，我们则会发现英国人往往选择较正式、高雅的语体，而美国人则倾向于选用较随意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语体强烈的民族性使然。在一种民族共同语的内部，并存着许多同义却不同功能的语言材料，这些语言材料是语体存在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实际的语言材料，语体就会变得不可捉摸。

由此，语体作为全民语言的功能变体，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历史的形成，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它却又有着相对的稳定性，这就使某一时代语体特点的研究成为可能。各种语体在不同的交际领域和需要下产生，又共同为整个社会服务，从而形成该时代的语体系统。它们之间具有复杂而有序的关系：(1)“同源”关系，它表明各种语体构成的物质基础都是民族共同语的语言材料和表现方法，它是所有语体都只是共同语的变体而不是独立语言这一本质在彼此关系上的一种体现。(2)“对立互渗”关系，从横向上来说，同层次的不同语体类型之间既互相独立作为一种原型范畴而存在，同时又互相渗透交叉，以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这是其作为功能变体的必然表现。(3)“包孕层进”关系，从纵向上看，具有整体性的某类语体，由于内部的对立所形成的语体分支在语言特点上既保持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又包含在上位语体之中。语体的上述种种关系，纵横交错，构成了特定时代的语体系统。[3]

如果说语言材料是形成语体的特质基础，超语言情景因素则是语体形成的又一基础。这两大基础共同组成了言语交际的环境——语境。语境是言语意义的外部依托，是言语能指变为所指的条件，从这一认识出发，按照语境是否表现为言辞，我们把语境分为言辞语境和言辞外语境。言辞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个语言表达式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表现为言语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前后文，也包括口头语中的前言后语。言辞外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个语言表达式表达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环境因素，它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到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语言表达式同时出现的非语词指号(如姿势、表情)等。言辞外语境直接体现为影响言语交际的各种语境因素。[4] 在交际过程中，听话者要理解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式的真正含义，必须和说话者具有共同的语境因素；而说话者要使听话者明白自己话语的含义，也必须尽量考虑到听话者是否具备理解自己话语

的必要语境。如果交际双方的语境因素不相一致，就会导致交际失败。语境因素一经由言辞表达出来，它就成了言辞语境。因此，言辞语境归根结底所反映的也还是言辞外的语境因素。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各种语境因素与语体的关系。

## 二、语境和语体的关系是互动统一的

当语言学家描述一种语言的结构及整理该语言的词汇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我们引进这一神秘事物的中心。当然，离开了语法、词汇和语音的描述，我们就无法了解语言系统。但是，语言是源源不断的人类生活及活动的一部分，语体和语境是作为整体中相互有关的部分出现的。忽视这种相互的依赖关系，人类的交际就无法实现。社会生活的分工导致不同的语境出现，不同的语境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表达式，从而促使语体的产生，而某一语体在特定的语境中频繁而又稳固的出现也便完成了它对于语境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互相的，二者缺一不可。

### (一) 语境由一系列与语体选择密切相关的因素构成

言语交际是在语境中进行的，并受语境所制约。而语境因素是无限的，在特定交际中，并不是所有的语境因素都均衡地对语体的选择施加影响。我们认为，作为言语交际环境的“语境”，是由一系列同言语表达与理解相关的主客观因素构成的系统。千百万人的言语实践告诉我们：言语交际的主客观因素都对言语形式的选择和表达效果产生影响。平常所说的各种语境因素便是从大量的言语实践调查中概括出来的。但这些因素是和一定言语交际相对而言的，不是任何言语交际过程的每一言语选择都会受到同样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时这一言语形式的采用受某些因素影响大一些，有时另一言语形式的采用又明显受到另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在特定交际过程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语行为、言语方式及其效果的种种因素所构成的集合体，才是我们讨论的语境。因此，语境总是和言语活动密切相关的，并围绕着一一定的言语交际活动——语体选择的过程而由不同的语境因素临时组合而成的。割断和言语交际的联系去空谈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及人的身份地位等，就很难说得上是语境。以社会环境为例，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领导和下级之间的谈话与父亲和女儿之间的谈话所涉及到的语境因素就不可能一样，前者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比较大而后者更多的是取决于交际者之间的伦理关系。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的短工和“我”，尽管在同样的社会环境和交际场合谈到祥林嫂的死，但一个说“死了”，一个说“老了”，这也说明影响两人当时采用不同语体的语境因素主要不是客观环

境，而是他们的身份地位、思想修养等主观因素不同。如果割裂语境和语体选择之间的关系，单把他们谈话的客观环境当作语境，则无法解释他们选择“死”的不同语体形式的原因了。语境之所以是语境，就因为它是言语的环境，因而它总是同人们的言语交际密切相关并且相互依存，制约着表达一方的言语行为，并为交际对象正确理解话语的意义补充情境意义，一切有可能形成语境的主客观因素，若失去了和言语交际活动的联系，失去了和语体选择的联系，便丧失了充当语境的条件。

## (二) 语境和一定的语体选择相始终

语境既然指言语交际的环境，那么构成一定语境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集合体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言语交际活动的改变而改变并和一定的语体的选择过程相始终。

从心理现象考察，言语表现为一定的活动过程。心理学界认为“言语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交际的双方都在感受器和效应器中进行着一定的活动。”[5]其中包含了说写者主要通过言语运动分析器的活动进行言语表达的过程和听读者通过言语听觉分析器或言语视觉分析器的活动对语言的感知、理解过程。但是言语交际毕竟不只是个体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它还是交流思想感情的社会现象，“如果说人的感知、记忆、想象、思维等心理活动都是内部活动，那么言语活动的一大特点即它是重之于外的，无论说出的或写出的言语都可为别人所感知，所接受；而且言语只有在为人所感知，所接受的条件才有实际的意义。”[6]因此人们的言语表达总是表现为包括对方的感知和理解在内的一定交际过程，表达者所选择的言语形式，所传递的语义信息和达到的表达效果都要根据交际对象的感知和理解来检验。因而言语表达也必须在一定交际过程中，根据各种主客观因素形成的语境的影响，对各种同义形式作出选择，寻找正确的语体，而不是超脱语境去奢谈表达效果的好坏。语体选择是以适应语境为第一要旨的。如《中国青年报》上曾刊登了一篇题为《人口普查员的语言文明》的文章，写到一个青年普查员碰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他问老太太：“有配偶吗？”老人愣了半天，然后反问：“什么配偶？”普查员只得换一种说法：“就是你丈夫呗。”老太太笑了：“你说丈夫不就得了，俺们哪懂得你们文化人说什么配偶哩！”孤立的看“配偶”和“丈夫”是同义表达式，但却属于不同的语体，老太太由于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无法理解较高级的语体形式，因此交际失败。由此可见，语体选择必须和语境因素相一致。同时语境因素也必然伴随着语体选择的转换而发生改变。普查员在换用第二种语体形式表达相

同的语义信息时，交际双方的认知和前提已发生了变化，普查员由先前不知道对方的文化程度低到有一定的了解，语境因素发生了变化。

由此，和言语表达密切相关的语境必然同一定的语体选择过程相始终。当言语交际开始时，存在于交际双方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围绕一定的交际任务和目的形成协调统一的语境，制约着交际双方对言语形式的采用和理解。而当这一交际任务完成，开始另一语义信息的交流，旧的过程也随之结束，代之以新的交际过程——这时构成语体选择的语境的各种因素也随之发生变化，形成新的语境集合体，对言语形式的采用和理解产生新的影响。千百万言语交际的实践证明，语言特征、超语言情境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组合时刻都在发生，作为动态的集合体，语体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应是互动统一，缺一不可的。

### 三、语境对语体的选择

语言材料是形成语体的物质基础，它和生成语体的外部条件——语境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利用特定语境，人们可以确定音节的所指，选择词语搭配，解释语法现象，甚至创造新颖的修辞手法。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存在着大量的超越常规的句子，如“妈妈，你脸上的微笑是爸爸寄来的吧。”“笑”与“寄”搭配从语法上来说是不恰当的，但这个句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却把它当作传神之笔。这些超越了词汇和语法规则的句式为什么人们不会误解反倒十分欣赏呢？其实，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言语形式本身，而是它所表达和传递出的特定语义信息，这个特定的语义信息正是言语形式和交际的语境相结合的产物。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境对言语形式有一种解释作用，它使某一言语形式与某个特定的意义联系起来。在语言系统中，每个词语都有它自己能指的意义，有它自己的义项系统。当这些词语被组合成一个语义系统时，由于相互制约，一般说，句子中的词语只有一个义项与其他词语实行组合，这就是语境对语义的制约性。

1、语境可以确定语义所指。经过筛选后的词语组合成一个语义序列，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意义仍然是能指的，抽象的。如：“得了一所大宅子”，这个句子排除任何语境，它只是语言系统范畴的一个实体，在这里“大宅子”所反映的是物类的概念，其能指意义是该概念的内涵。如果句子进入某个特定的语境，那么“大宅子”的能指意义便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如：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鲁迅《拿来主义》

在这里“大宅子”被赋予所指意义即“古代或外国遗留下的文化遗产”。在规定的情景中，言语形式与相应的客观对象一旦建立起联系，词语便从反映概念的内涵转换为表现该概念的某个特定外延，从语言系统抽象的规约意义转换为言语系统具体的所指意义。可见，交际情景和交际过程的具体情况直接影响着言语形式的所指内容。

2、语境可以消除歧义信息。在汉语当中无论是语义、句法还是语用上都存在着大量的多义结构。词语是表达概念的，概念则反映了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千差万别，无穷无尽，而人们用来交际的词汇总是有限的，相对稳定的，如果有多少客观事物，就创造出多少词语，使词汇无止境的扩大，就会给人们学习和使用语言造成很大的负担。一词多义在客观上解决了语言形式的有限性和客观事物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也使语言表达出现大量的歧义结构，如“鸡不吃了”这个句子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吃鸡的人不吃鸡了”，一是“鸡不吃东西了”，到底人们指的是哪一种解释呢？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说得清楚，如：

有鱼就行了，鸡不吃了。（第一种解释）

别再添饲料了，鸡不吃了。（第二种解释）

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要求表达清楚，语义准确，不能够含糊其辞，如果出现歧义现象则必须排除。事实上，语义和句法上的歧义现象在语境中出现的情况是很少的，它在语境中便能自动排除，如上例所示。

因此，语境具有重要的消歧功能，倘若交际双方在语境上不能保持一致，势必会造成语境歧义。所谓语境歧义是在特定的言语交际中与语境因素有关的歧义现象。语境是表达者正确传递信息和接受者正确理解信息的桥梁，倘若双方的语境因素不能协调统一，为对方所了解，势必会导致语境歧义。如上文所举的人口普查员的例子，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交际对象的文化素质等背景知识而导致交际失败。产生语境歧义的原因有很多，交际双方的交际前提不一致，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个人情况等都会导致歧义产生。吕淑湘先生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1954年国庆前夕，某机关的游行筹各组开会，筹备小组的一位女同志直

布：“今年游行，女同志一律不准穿裤子”。[7]

这句话刚一说完就引起了哄堂大笑，原因是表达者想传达的实际意思“只能穿裙子”与她所说的言语表达式在外延上不一致，而接受者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其意思。交际双方要想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必须充分利用已知的语境因素，避免语境歧义的产生。

3、语境可以创造言外之意。一般地说，经过语境的限定，交际者就可以快速而准确地推断出言语的意义，但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语义要远远复杂的多，这是因为，语境具有另一重要功能——创造言外之意。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没有语言，思想就不能产生和存在，更说不上表达和交流思想。反之，离开了思想，语言只剩下空洞的声音，不再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也就无所谓语言了。“意”即在“言”外，思想不是脱离了语言吗？其实不然。言外之意是交际者依靠语境临时创造出来的，离开了特定语境就无所谓“言外之意”了。比如说“我恨你”这句话，如果是从恋爱中的姑娘口中说出，它传达的恰恰是与字面相反的意义，这种意义只有依靠姑娘娇嗔的神态和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推断出来。如果这句话是两个反目成仇的人说出的，传递的信息就与字面意义相一致了。所以说，语境是连接语言和思维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交际中，语言和思维统一于言语环境之中。[8]

具体说来，言外之意有三种情况，一是不必言明的意思，二是不便言明的意思，三是不肯言明的意思。[9]这三种情况得借助特定的语境才能表达出来。《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两小无猜，心中暗含情愫，两人之间的相互关怀自是心照不宣不必言明的；但黛玉自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身处封建的诗书礼仪之家，自由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因而她虽对宝玉“存着一段心思”，却又有许多不便言明之处；有一次宝钗劝宝玉别喝冷酒，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烫热方饮，这时：

黛玉碰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丫环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教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到我！”……黛玉一迎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红楼梦》第四回）

这一段话语带双关，那言外之意完全是对着宝玉的。当着众人的面自然是不便言明，出于她的孤独处境和孤傲性格，那心中泛起的醋意更不肯言明。俗话说“听话听音”，话即由词汇意义组成的言语意义，音即言外之意。这就是说，听话不能局限于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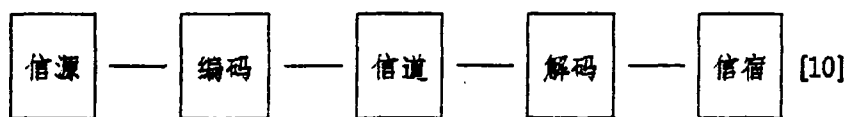
一定言语形式的理解，而必须充分考虑言语在此时此境所负载的言外之意。言语形式和意义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相背离甚至相反，这就需要我们借助特定的语境去推断和理解。所以说，言外之意并非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思想，而是使用语言时由特定的言语环境补充、创造的意义。

## (二) 语境对语体的选择

正因为语境具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它对语体选择具有直接的影响，正确的传递语义信息，是表达者的首要任务，但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已达到了交际目的。千百万人的语言实践告诉我们：在言语交际中，一定的语境因素总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并协调一致地制约着言语形式的选用，也就是说语境对语体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表达效果。在很多场合，人们常常为了虽正确传达了语义却言不得体而懊恼，这正是忽略了语体选择而导致的。

人们怎样利用语境所提供的条件进行交际，并如何选择最佳语体，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职能，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呢？

根据信息学原理，言语交际也就是一个信息传递系统。那么它就应该具有信息传递系统的模式，即：



这五个环节分别指向言语交际诸因素：信源即表达者，信宿即接受者，编码和解码分别对应于表达者的表达和接受者的理解和推断过程，信道指交际方式（口头语言或书面文字）。这些要素是构成言语交际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大量的言语实践证明，言语交际效果如何不仅要看表达者所选择的言语形式或语体能否恰到好处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尤其要看交际对象能否准确理解并乐于接受对方发出的信息。那么在选择恰当的语体时，交际者既要面临自身因素，也要充分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

1、从自身来说，影响交际者语体选择的重大因素是风格。由于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的地理环境不相同，这样，独特的形式与特定的内容相结合在语言表达上就会呈现出与别的民族不同而为本民族所独有的格调，如语言形式的特点，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等，这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如汉语词汇里的双声叠韵词，以及从人民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大量的成语、谚语等都是形成汉语民族风格的重要因素。然而，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

同，不同时代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精神风貌、时习风尚，体现在语言上就使语言表达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表现出不同的格调，这种格调就是时代风格的表现。而在同一时代中，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人们交际的内容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各种语体的产生。不同语体在语言表达上的独特性使它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体式的独特的格调，这就是语体风格。由于语境的不同形成语体风格的差异，而语体风格的差异又主要体现在各个语体对语言运用进行限制时所形成的言语表达特点的不同。人们在进行语体选择时，必然受到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和语体风格的影响，而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又通过语体风格体现出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语体风格的形成。语体风格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固的特点，从而指导人们在交际中的语体选择，如果语体与语境相适应就会表现为相应的语体风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体也变成了一个次言语环境，人们可以在该语体内进行语音调整、词语选择、句子锤炼等具体操作。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即使是使用同一语体，由于各人的思想性格、文化程度、身分地位等不同，在语言表达上也会呈现出一种独特而稳定的格调，即个人风格。个人风格是人的个性特点在语言运用上的表现，它与语体风格交织在一起，所以又有人称之为附加的语言风格。

“个人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一方面要在交际场合的允许下构成其独特的言语风格，来表现他的性格，以性格的表现作为他的交际目的之一。”[11]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同的人尽管应用同一语体来表达，也仍会表现出不同的语言特点和独特风格，个人风格对于交际者的语体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汽车因故突然煞车，车厢里有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猝不及防，无意撞到一个女青年身上，女青年责骂道“德行！”那人马上解释“惯性”，他的回答引起了乘客的一阵笑声。这位知识分子没有以骂语回敬对方，而是选择了科技语体的物理术语，既符合此情此景，又显示了幽默高雅的思想性格，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表达者是言语交际中信息传递的主要渠道，能否选择恰当的语体关系到交际的成败，这就要求表达者努力提高个人修养，充分利用个人风格特点选择符合语境又不失个人风格的恰当语体，以达到预定交际目的，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

2、在言语交际中，接受者能否正确推断和理解表达都所发出的信息是检验交际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是促进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因此作为发出信息的一方，表达者要充分考虑到交际对象的主客观情况，选择对方最乐于接受的言语形式，选用最适合语境的语体。在选择语体时，听说者的思想修养、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就



显得尤为重要。如上文所举年轻的人口普查员的例子，就是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客观因素才导致交际失败的。单从语言上看“配偶”一词是符合语体要求的，但结合语境来说就言不得体了，从此例中也可证明语境对语体选择的强大制约性。其次，为了更好的完成交际任务，表达者还要善于“察言观色”，依据对方的处境、心情、心理等采取恰当的言语形式。处境、心情都是语境中的临时因素，它的变动不居影响着每一次语体选择的过程。特级劳动模范北京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张秉贵同志因语言得体而多次受到顾客称赞，当顾客走过时，他马上点头致意，亲切地招呼“同志，您看看什么？”他对顾客所说的话是很切合各种顾客的心理的，因为有的顾客是想先来看一看东西，有的虽然是买东西，但也要先看好才买，他所选择的语体充分考虑到各种顾客的心理，让人感到亲切、满意。第三，充分考虑对方所在民族的文化背景也是选择语体的关键。“人们不得不生存于世，生存于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生活于家庭、邻里、街道、城市等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而是生存于按一定的话语规范组织起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生存依赖于一定的话语规范加以调整和节制，而这种话语规范正是要达到调整或节制的实际效果。”[12]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时刻在制约着言语交际。现代汉语中那些含有深层义、言外义或双关义的句子即使可以进行结构分析，但如果脱离了民族文化背景其真正意义也难以发掘和认识；因为一讲到意义，就会涉及全宇宙的事情，哲学的、科学的、人生的……，就会牵扯到许多非语言的问题。例如“你吃了么？”这句话，作为中国人之间的招呼语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却遭到一位外国留学生的抱怨：“你们怎么老问我吃饭了没有？我口袋里有钱！”为什么这句被中国人讲滥了用俗了却仍津津乐道的句子，却遭到外国人的非议，不是因为别的，正是文化——这统治人类生存状态的神秘力量在背后作祟。

总之，语境所具有的多样而强大的功能，使它对语体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言语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的交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社会上共同关心的问题，时代脉搏的跳动，政治气氛的影响，文化生活的熏陶，自然景物的观感等因素，无不在制约和影响语言的运用。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制约因素，找到言语形式与语义信息完美的接洽点——适当的语体，才能顺利完成交际任务。

## 四、语体对语境的适应

语境对语体的选择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人们在以往的研究中过于强调这种制约性，甚至将语境置于决定一切的统治者地位。以语境中的超语言情景因素作为划分语体的标准，固然有其理论意义，但操作性并不强，要么失于笼统，要么流于琐碎。语境作为言语活动的外部依托，只能对不同言语类型的选择起一定制约作用，而在根本上决定语体特点的还是不同的语言手段本身。强调语体本身的研究，对于语体实质性的把握、语体研究的方法、语体教学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节拟从语体的习得、语体的交叉渗透和语体的转换三个角度来探讨二者的关系问题。

### (一) 语体的习得

儿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不能遗传的，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必须重新习得语言，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人类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学会了使用不同的语体。儿童一开始并不懂得区分不同的语体，如他在任何场合都会说“我要尿尿”这句话，而不管当时是否在吃饭或有客人在场等不适合此种表达方式的语境，但成年人对于同样的语义在不同的场合却可以选择不同的语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人不需要学习语体。即使是善于交际的成年人，有时也会因言不得体而烦恼，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处于一个新环境中感到窘迫，不知道说什么或怎么说才好；对于一项陌生的写作任务不知道如何下笔才好。这些都表明，不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必须习得或学习语体。

语体的习得是和语境密不可分的。现实的语言材料和相应的语境是语体习得的物质基础。语体习得者依据他人一定语境中交际效果的好坏，判断语言运用得体的程度，找出语言特征与语境因素的适应规律。但是语境类型和语体的适应关系并非一一对应的、静态的、显在的，构成语境的各种因素如场合、时间、地点、目的、任务等都是随时改变的动态因素，而它们对于语体选择的制约作用也不是等同的，只有与特定的言语交际密切相关的因素才会具有影响力，而特定的语体也不是全盘静态地体现在某一语境中。因此，语体的习得并非一步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反复的观察比较和模仿。学习者在识别了不同的语境和语体之后，还要进行大量的模仿操作。也许一个儿童在饭桌上说出“我要去方便一下儿”，正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观察而模仿他的父母或亲友的结果。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语境，更没有主观因素完全一致的交际者，这就决定了学习者不可能完全照搬某一范本就可以做到

得体的交际。他必须一方面识别自身与交际语境诸因素的关系，另一方面力图掌握与某一语境相适应的语言运用特点系列。这两方面的把握正确与否，正是通过一次次地识别语境类型，尝试模仿他人“得体”的交际的过程。语体模仿的过程并非可以获得该语体的全部特征，语体模仿的物质基础是先存的言语材料，这些材料被认为是得体的，然而并非该材料的所有特征都是语体的特征，因为语言运用的个人风格总是或多或少地对语体特征产生影响。又由于各人主观条件和学习差异，每个人所把握的语体特征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是有交叉和相异之处。由此可见，客观上语体的存在依赖于言语集团成员对先在言语材料得体程度的认可以及由此而生的模仿行为。各人所掌握同类语体特征的交叉部分构成语体的核心特征，而其他的一些特征则是构成语体内部分下一层次分类的次要特征或多种语体的共有成分。所以语体是一种原型存在，它是历史地产生的。

学习者经过大量的语境识别和语体选择的训练，逐步掌握一定的语体能力。这种能力是动态的，它永远处于对语境诸因素的辨析和对交际效果的检验之中，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立足于此，回顾语体界以前对语体分类的纷争，如根据交际领域、话语方式、思维类型等，无不是偏重于语境，这类探讨固然揭示了语境对语体形成的制约作用，但是却造成了语体分类的混乱状态。客观的说，语言特点系列是语体识别和模仿的直接物质基础，与之相关的语境却是动态的，临时的，只有以语言特征为本位，兼顾各种语境因素，才能更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言语实践，不违语体研究的初衷。

## (二) 语体的交叉渗透

作为语体形成物质基础的语言材料经过千百次的使用，逐步发生功能分化，才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语体体系，由此看来，语体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交际领域、场合、目的、内容、对象的不同，是语体封闭性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正是因为这种封闭性，才使得语体得以区别开来。但语体同时又是一种原型存在，在相对稳固的核心特征周围，有大量相对自由可以游离这个原型的次要特征，这些次要特征就象物质中的自由分子在游离母体之后又可以与其他“物质的分子”相结合形成新的语体要素。因此，原型存在的方式决定了语体具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在某一语体的要素可以进入另一语体中，构成另一语体的言语作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表现为某一语体可以吸收其他语体的要素来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这两种属性是缺一不可的。没有封闭性，语体就无法存在；没有开放性，语体就无法发展，

失去了生命力。从共时的角度看，封闭性是基本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从历时的角度看，封闭性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开放性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就使语体的交叉渗透成为必然。[13]

同时，语体的交叉渗透现象是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语境使然。语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正是因为社会生活不断地分工，才形成了今天所使用的各种语体。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由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发展缓慢，语体的种类变化也不大。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社会生活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人们进行言语交际的语境的多样化，仅仅用祖宗传下的几种语体进行交际早已不能胜任，必然促使新的语体不断产生。但是人们每天重新学习一种新的语体是不现实的，语体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稳定性，我们必然要借用旧有语体中有用的、合理的成分来重新组合新的语体，或促使旧有语体潜移默化的改变不断产生变异形式。这种变异便是语体的交叉和渗透现象。

语体的交叉渗透与语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影响语体交叉渗透现象产生的语境因素又有哪些呢？

首先，语体交叉渗透中的变异与民族心理习惯有密切的联系。汉民族在语言运用中十分注意发挥声韵、节奏上的特点，做到回环往复、抑扬顿挫、和谐优美。这种心理对于汉语语体的分类和变异有很大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本来属于应用语体的广告往往采用对偶、压韵、谐音等语言形式，大量借鉴文艺语体的要素，如长城牌电扇的广告语“长城电扇，电扇长城”就采用了对偶形式，读起来琅琅上口，便于诵记，从而使长城电扇成为家喻户晓的产品。

其次，时代因素对于语体交叉渗透也有重要影响，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直接参与政治生活，许多政治术语一下子涌入谈话语体和文艺语体中。文革十年，左倾思潮影响严重，人们即使日常交谈也要一口一句“毛主席语录”以示忠心，就连打电话，一拿起话筒也得说一声“为人民服务”再问“你哪里”，通话完毕还得说句“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才把话筒放下。而进入八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术语“反馈”、“网络”、“多层次”、“多渠道”等带有科技语体色彩的词语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为语体交叉渗透提供了条件。

人的因素对于语体交叉渗透也有影响，言语交际中表达者一方担负着传递信息的主要责任。他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个人风格等都对语体的选择产生影响。一般说来，文化素养较高、风格独特的人对语体进行变异的能力也强，语言大师都是

语体变异的巨匠，所以他们对语体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文学巨匠鲁迅就曾开创了杂文这种短小精悍却主题深刻的新语体。他们谱熟多种语体的语言特点，就能够熟练地进行变异和创造，为语体之间科学地交叉渗透作出贡献。

### (三) 语体的转换

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还存在着一种语体转换现象。交际双方关系的改变，交际前提的改变或交际者主观心情的改变都会导致在同一言语交际中使用不同语体的现象，我们称之为语体的转换。语体的转换是交际者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广泛采用的一种方式。例如在火车上有两位上海人坐在一起，先用普通话交谈，当他们发现彼此都是上海人时，就都改用上海话交谈了，这样就使交际双方的关系更为融洽、亲切。而在《红楼梦》中为了达到预定交际效果使用语体转换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如：

元妃又向其父说：“田舍之家，盖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元妃听了宝玉能题，便含笑说道：“果进益了。”元妃因问：“宝玉因何不见？”……命他进前，携手揽于怀中，又抚其头颅笑道：“比先长了好些——”一语未毕，泪如雨下。

——（《红楼梦》第十八回）

无春省亲表面的“鲜花着锦”之盛掩不住骨肉分离的悲切，用文绉绉的书面语体叙述内心的哀怨；当提到她自幼照看长大的宝玉时，话语转为口语语体；及宝玉至进前，再也不能抑制强烈的感情，极为口语化的句子与悲痛相伴而涌出口，这里语体转换极为自然可信，将人物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总之，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语体的习得和语体的交叉渗透都是适应不同语境的结果，而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语体转换则是交际主体为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而采用的一种灵活的表达方法。它们都体现出了对语境的能动的适应能力。

## 五、结 语

语体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它与它所服务的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产生于社会环境之中，因社会交际需要而为人们所使用，并随社会交际需要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因此，语体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语体使用者——人和语体使用的环境——社会，正是它们引发、推动或抑制了某一民族、某一时代的语体面貌。但语体之所以能够

在语言系统中产生、存在并不断地发展完善，不仅仅在于外部的环境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语言系统内部存在着发展变化的潜在机制。语言是无时无刻不在变的，这种变化是语言系统自身保持平衡和秩序与打破平衡和秩序这一潜在机制不断运动的结果，其动力自然来自语言系统之外（语境）。但原型存在方式与交叉渗透趋势、信息冗余与语言省略，民族文化背景与跨文化语体交际等这些语体系统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还未引起语体学界足够的重视。然而正是这些矛盾的对立构成了语体变化的内部动因。所以我们强调语体研究应该走到以语言为本位的路子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晰、更透彻地揭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语体系统的发展规律。

当前语体学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研究的立足点问题。以超语言的情景因素为出发点，还是立足于语言本体一直是语体学界争议颇多的热点。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没能很好的解决二者的关系问题导致的，专门写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但是由于笔者水平有限，直到现在才得以定稿，它就象一株羞涩而稚嫩的小草，虽然很不成熟，却蕴含着园丁们辛勤的汗水。本篇论文从构思，起草到最后定稿，都得到了导师们的悉心指导，王兴中教授为此文的写作倾注了心血，骆小所教授、王渝光教授、颜晓云教授、张华文教授也给予我无私帮助和亲切鼓励。在文章的结尾，我谨向三年来辛勤培养和关心爱护我们的各位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 注释:

- [1] 雍和明《语言变化三位一体论》，《外国语》1996年第3期。
- [2] 王德春《语体略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 [3] 参见李熙宗《语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语体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 [4] 王建平《语境的定义及分类》，《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 [5][6] 刘焕辉《语境与言语交际》，同上，第445页。
- [7] 吕淑湘《歧义类例》，《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 [8][9] 参见王德春、陈晨《语境学》，同(4)，第154-155页。
- [10] 王维成《超语言因素和语体分类》，《修辞学习》1987年第1期。
- [11] 北京大学编《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第186页。
- [12] 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 [13] 袁晖《试论语体的交叉渗透及其社会因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 参考书目

- [1]、王德春《语体略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2]、唐松波《语体、修辞、风格》，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3]、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编《语体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4]、西木真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 [5]、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
- [6]、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7]、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8]、周文柏《文艺心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9]、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 [10]、霍四通《语体研究方法论系列探讨》，《修辞学习》1997年。
- [11]、许力生《当代语体研究中的不同模式与取向》，《外国语》1997年第5期。
- [12]、李建芳《试析语体的习得过程》，《修辞学习》1998年第1期。